

合一的教宗

若望廿三世及保祿六世

張少麟¹

本文作者從大公主義角度出發，給影響梵二時代精神最深遠的兩位教宗，對基督徒合一運動上的貢獻，做了詳實的評介。

前言

大公主義的課程，使我獲益不少，也成長了很多。特別在面對其他基督宗教時，心態上的轉變最大。我不會像以往那樣，視他們是分離的原因，把一切過失都怪在他們身上，反而是回到自身做反省，也覺察到我們在這一方面，也有過失。

雖然，對於合一有不少的了解，但總覺得教授在課堂上有限的時間裡，無法更仔細地給同學講解教宗若望廿三世和保祿六世對合一的貢獻。所以，我便在課餘時，嘗試去多加了解。現僅將自己所知道的，以論文寫作的方式來給大家分享。

本論文將分三部分來發揮：（一）若望廿三世任駐外使節時期，（二）若望廿三世對合一的貢獻，（三）保祿六世對合一的貢獻。

我把若望廿三世的駐節時期做為此論文的出發點，是因為他在此時期裡與東正教的弟兄們有著密切的關係；也是他的這

¹ 本文作者：張少麟執事，馬來西亞華僑，主徒會士，輔大神學院神學系畢業，現正在愛爾蘭進修。

個經驗，促使他召開梵二大公會議，推動基督徒合一。可是，第一會期結束（1962年12月8日），若望廿三世逝世（1963年6月3日）。繼承其任的是保祿六世。他繼承若望遺志，完成了大公會議，並為基督徒合一頒佈了大公主義法令。就因著三者間有著密切的關係，所以在本文中，我做了這樣的一個安排。

一、若望廿三世任駐外使節時期

1. 駐保加利亞時期（1925~1934）

1925年4月25日，他奉教宗庇護十一世之命，自義大利的米蘭來到保加利亞的首都索非亞（Sofia）任視察使。當他到達之時，保加利亞的天主教正由兩個不同教區的傳教士所領導；此外，更有行東方禮的天主教。雖然困難重重，他卻以代表教廷的職權，盡力促使西方及行東方禮的天主教合一。

在此時期，保國也曾一度發生經濟恐慌，許多人民，掙扎於饑餓的邊緣上。他便盡力濟助，絕不問對方的社會地位和宗教信仰。另一次，保國又遭地震之災，他依然幫助一切需要幫助的人。他的仁愛慈祥和大公無私的精神，漸漸地被人認識²。

他的努力受到肯定，就像他被調往君士坦丁堡，在惜別的宴會中，人們對他所表現的一樣。他曾在家書中，描寫了當時的情形：

「……在索非亞的最後幾天給我極大的安慰，因為我可以看出保加利亞人、甚至東正教人都十分喜歡我。我和波里斯王和約瓦娜王后（King Boris & Queen Giovanna）話別，他們每人都和我談了一小時。……國王送給我他自

² 參閱：張秀亞，《現任的教宗是誰？》（台中：光啓，1959年），27~28頁。

己的照片，用銀質鏡框鑲著；又送給我一個美麗的十字架。這十字架來自亞托士（Athos），是他還是王子時，東正教總主教送給他的禮物；還送給我保加利亞最特出人物才可以獲頒的最高勳章。這一切禮物表示國王和王后對我的情意……。³」

他在保加利亞的十年中，對東方教會也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及愛護。他熱愛行東方禮的天主教會，亦如西方天主教會一般。當他登基就教宗之位時，曾向世界廣播，其中有一段大意是：

「我們愛護西方的天主教會，而對東方派的天主教會也懷有同樣的愛；我們伸開雙臂，敞開心扉，等待著那些一度脫離羅馬教廷的教友們，重新來到教宗伯多祿繼承者的座前。⁴」

2. 駐土耳其、希臘時期（1935~1944）

1935年1月，他再次奉教宗庇護十一世之命，自索非亞移駐君士坦丁堡（Constantinople，又稱「依斯坦布爾」Istanbul），就任宗座駐土耳其及希臘代表，兼任君士坦丁堡教區的監牧⁵。

土耳其是個信奉回教的國家，所以對這位教廷派來的代表極為淡漠，覺得他無足輕重。然而，他卻鑒於時事的需要，加強職務中的傳教工作，一切都本著愛主愛人的精神去做。他在工作繁忙中，也不忘多了解土耳其人的文化、生活和心理。

³ 梁偉德譯，《教宗若望廿三世家書》（台北：光啓，1985年），89頁。

⁴ 張秀亞，前引書，29頁。

⁵ 同上，27~34頁；王化宇，《教宗若望廿三世與來屆大公會議》（台中：光啓，1961年），17~20頁。

一天，他走進一座行拉丁禮的聖堂，聽到教友們用法文誦經。於是，他詢問道：

「他們都是法國人嗎？」

「不，他們都是土耳其人。」

「那麼，譯成土耳其文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不久，教友們便完全改用土文誦經了。

他又發現一些回教婦女，經常往聖堂中祈求聖母的助佑。他認為這是一個使他們認識真主的好機會，乃給他們印發許多「天主經」及「聖母經」的小卡片；以後，便可以聽到這些婦女誦唸經文的聲音了。

在一次的地震中，他仍保持在索非亞時的仁愛、大公無私精神，去幫助所有遭難者。理所當然的，也給當地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此外，他也常到希臘京城雅典去。希臘則和土耳其相反，完全是東正教的人士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推動天主教的教務，本已極為困難，希臘政府又頒佈了限制其它教派傳教的法律，使一些原來行拉丁禮的天主教教友，幾乎無法保持其信仰的自由。雖然環境不佳，但他仍然以愛主愛人之精神，去為那些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受害人民做仁愛的工作，並改變了他們過去錯誤的觀念，而受到了愛護和尊敬。

當他離開駐土耳其和希臘時，羅馬觀察報對他的評論是：

「近年來，他所遭遇的困難很大，但他能克盡職守，是教宗庇護十二世旨意的忠誠實踐者。」

綜觀他在東方國家駐留的二十年中，都是以外邦宗徒聖保祿的遺訓，來處理教會事務：

「你們因著信仰耶穌基督，都是天主的子女，所以，凡你們因著洗禮，歸依基督的人，就都穿上了基督。並不分誰是猶太人、誰是外邦人、是為奴的、是自主的、是男

是女；因為一切的人，在耶穌基督內，都成了一個。」（迦三 26~28）⁶

他如此豐富的經驗，也為他日後奠定了召開大公會議的基礎。

二、若望廿三世對合一的貢獻

1. 教宗對合一的渴望

1958年10月29日，當選教宗的次日，他在給全世界的廣播文告中，很自然地提及教會合一說：

「我們同樣的關懷東方與西方的兩個教會，並且我對所有與我們的宗座分離的人士也願加以照顧，那宗座是伯多祿直至世末活於他的繼承人的聖座，並履行基督授與他在世上能束縛或解開的使命，或牧主之羊群的任命的聖座。我們熱烈願望他們回到天父的老家，並同時誦求主之言：『聖父乎！求父以己名義，保佑父所賜予之眾，使成一體，猶父與子之為一體。』於是『終惟一棧一牧。』我們呼籲大家都心甘情願的前來吧！不要回到他人之家，而要回到自己的本家，從前他們祖先以非凡的道理光耀之家，並以超群的德行揚名之家。⁷」

在11月4日，加冕時，他講道說：

「範圍還要擴大：『我有些別的羊，未入此羊棧；我應當把牠們也引回來；牠們必將聽我的聲音，如是則其他的羊，同屬於一個牧者。』（若十 16）看啊！這是廣大

⁶ 王化宇，前引書，20頁。

⁷ 李貴良譯，〈教宗若望廿三世首次向全球與羅馬廣播全文〉《恆毅月刊》，第八卷，第五期（1958年12月號）。

美麗的傳教問題，是羅馬教宗懸念的所在。⁸」

12月15日，在御前會議的演講中，他也提及：

「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本來早已脫離羅馬聖座，或者甚至不是基督的信徒，他們也向我們表示他們的一番敬意。這些敬意的表顯，並不是向著我們微賤的本人，而是向著公教的元首，羅馬教宗，歷史上常證明不僅是保衛公教，而是保衛各民族和平安寧的領袖。⁹」

從以上的演說中，我們不難看出，教宗總不忘記合一的問題，常會一再重覆他的思想。因此，他長久渴望合一的願望，終於在1959年1月20日得以說出。

「那天，他坐在辦公桌前，國務卿他爾地尼（D. Tardini）樞機謁見。這是他每日接見外賓前，慣例要第一個接見的。就在這一天，從他口中說出大公會議這幾個字。他偉大的思想也得到國務卿的贊同。所以，在五天後（1月25日），即聖保祿歸化日，教宗宣佈了將要召開大公會議的消息。¹⁰」

然而，在同年6月29日，他在所頒佈的《伯多祿座位》（*Ad. Petri Cathedram*）通諭中也提到大公會議要旨：

「發揚信德，復興教友的基督化生活，並使教會的紀律適應現代的方法與需要。」

「這定是真理、合一、愛德的壯觀，我們深信，那些與聖座分離的弟兄見到，等於是一種研究耶穌基督禱詞中所期待的合一道理的邀請，並因而能重新獲得。¹¹」

⁸ 杜而未，〈新教宗在加冕彌撒中講道摘要〉，同上。

⁹ 羅光譯，〈教宗首次御前大會演講詞〉，同上，第六期。

¹⁰ 參閱：陳文裕，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》（台北：上智，1989年），35~36頁。

¹¹ 穆啓蒙著，張鶴琴譯，《一牧一棧》（台中：光啓，1961年），67~68

2. 基督徒合一秘書處

當教宗宣佈要召開大公會議後，初步籌備工作隨著展開。直到 1960 年 6 月 5 日，聖神降臨節，教宗頒佈《上天授意》（*Supremo Dei Nutu*）手諭。手諭中，教宗命名未來的大公會議為「第二屆梵蒂岡大會」，並公開設置大公會議的籌備委員會，進入正式的籌備階段。此時，共設立了十個委員會和三個秘書處。其中之一是基督徒合一秘書處：教宗任命貝雅（Bea）樞機為主席。這秘書處在梵二第一會期之初，被提昇到與十個小組委員會同等的地位，因此也就有了與其它委員會同樣的組織和使命¹²。

這秘書處的成立，可說獲得很好的回應。在德國西發里亞（Westphalia）學院，路德派領袖與貝雅樞機及巴德朋（Paterbon）的總主教葉克爾（Yaeger）修札親密來往，討論兩位天主教人所寫的書，同意教會最近在神學方面，已較為接近。教宗又屢次接見基督教領袖：1959 年，接見英國主教司多胡（Stokwood）；六月接見英國詠禮團員李亞（Rea），教宗贈他一部日課；以後二次接見英國詹姆斯（M. James）；1960 年夏天，接見詠禮團員包來（B. Pawley）；秋天，接見法國泰澤（Taize）地方的基督教小團體。

可是，最重要的事件卻發生在蘇格蘭聖安特留（Andrews）；1960 年 8 月 24 日，世界教會委員會在此開會。立刻可以看出，他們在合一秘書處成立後，對羅馬的態度改變了。特別是英國坎特布里總主教，也就是全英國教會領袖費雪博士（G. F. Ficher），希望能拜謁教宗若望廿三世。

就在 1960 年 12 月 2 日，教宗和費雪博士做了一個歷史性

頁。

¹²參閱：陳文裕，前引書，65 頁。

的會晤。1962年1月17日，費雪宣佈自己退休，但他仍不忘為合一運動做最後貢獻，任命詠禮員包來（B. Pawley）為坎特布里總主教駐教會合一秘書處的私人代表¹³。

費雪的精神實在可嘉，因自四世紀多分手以來，他是英國教會第一位首長來羅馬見教宗的。在他以後，有許多耶穌教或東正教的高級人物也來訪問教宗。

3. 評估第一會期內的「合一」成果

1962年12月8日，第一會期結束。在兩個月的作品中，並沒有完成任何文件。所以不易直接看出此會期對合一有何貢獻。教宗也說：

「第一會期，好似大公會議工作隆重的小序曲，表達希望進入天主上智的中心意願。由各地而來的兄弟，共聚一室，逐漸彼此認識，雙目面對而視，表示心心相印；我們希望由各民族的傳教工作代表，揭出天主子女享受的自由。¹⁴」

然而，我們惟一能夠肯定的，是確實有著間接的貢獻。因為每位教長能接觸到來自各國、各洲、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伙伴，彼此交談、溝通、分享經驗，而在心靈層面有了大公的體驗與成果。

三、保祿六世對合一的貢獻

1. 保祿六世與大公主義

1963年6月3日，教宗若望廿三世逝世。十八天後，即6

¹³參閱：吳宗文編輯，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史綱》（台北：華明，1981年），28~29頁。

¹⁴同上，96頁。

月 21 日，米蘭總主教 Montini 樞機被選為新教宗，取名保祿六世。當選次日，教宗在加冕時演講說：

「我們將繼續前任教宗的工作，我們要護衛教會，不受內外信仰及道德方面的錯誤，而損害其美妙，我們要提高教會的牧靈能力，使它雖貧窮，但自由，這是母親及導師的職務，對子女慈愛、同情、忍耐，並邀請不是她子女的人。如我們已報告過的，我們將繼續大公會議，我們祈求天主，由這項大事，使教會信仰堅固，刷新它精神力量，使它的形式，適合時代的需要，能吸引分離的兄弟，以真理、愛德，與獨一的公教會結合為一。¹⁵」

就在 1963 年 9 月 29 日，教宗召開了梵二大公會議的第二會期。他在開幕禮的演講中，再次指出了大會的目標：其中一項是基督教會的合一。他說：

「如果對教會的分裂有我們應當承當的過失，我們謙虛地呼求天主寬宥；如果弟兄們認為我們曾經開罪過他們，也求他們寬恕。在我們方面，我們也從心寬恕所有開罪天主教的地方。¹⁶」

教宗這樣的態度，也給了合一運動一個新的詮釋。他如此做不僅獲得基督教弟兄的讚揚，也幫助了他在以後三個會期中完成了《大公主義法令》（以下簡寫：UR）。他在法令中，給我們指出一些原則和方向¹⁷：

a. 大公運動：

這不但是基督徒個別參加，而且是基督徒所組成的團體，

¹⁵同上，102 頁。

¹⁶陳文裕，前引書，110 頁。

¹⁷王愈榮譯，《梵蒂岡第二屆—大公會議文獻摘要》（台北：華明，1966 年），86~90 頁。

即上主的教會也都踴躍參加。(UR 1)

所有今日生於這些團體內、信仰基督的人，誰也不必負擔這分離之罪。凡有效的領受了洗禮的人，與天主教，雖則不完全，卻有某種的共融，而天主教會的子女理當認他們是主內的弟兄。況且，在天主教會有形的界限之外，也能有許多甚至有價值的事例存在：如成文的天主聖言，聖寵的生命，信、望、愛三德，以及其它聖神的內在恩惠。這一切都來自基督，並引向基督，照理是屬於基督的唯一教會的；同樣，有許多神聖的儀式.....也無疑地產生聖寵的生命，並開啓救贖、共融的門徑。(UR 3)

所謂「大公運動」就是指依正義與真理，為消除不符合分離弟兄情況的言語、審斷和事實所做的努力。隨即，因專家們所做的「會談」，使各基督團體之間做進一步的互相了解、互相敬重。

b. 大公精神：

在大公行動中，天主教教友首先需正直而密切的注意，天主教會內部所需要革新和實現的一切。(UR 4)

沒有內心的改革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公主義。(UR 7)

在某種特殊環境下，允許也希望天主教教友與分離弟兄，聚合而作祈禱。不過，對一切「聖事上的相通」，是主教應該明智地給予指示。(UR 8)

有適當準備的教友；應當對有關分離弟兄的一切，獲得更好的知識，特別在聚會時，大家應該平等相待。(UR 9)

神學及其它一切學術，尤其是歷史，也該依大公精神去教授。同樣，天主教教士也該認識，在他們傳教工作中所能遭遇到的問題。(UR 10)

絕對必須清楚地敘述完整的教義。「虛假的和平主義」是

大公主義的勁敵，它損害公教教義的純潔，並掩蔽了它真正而一成不變的意義。同時，應該運用為分離弟兄也能接受的語氣。

(UR 11)

c. 分離的教會與宗教團體

最初的分裂是發生在東方，因厄弗所和加采東公議會的爭論，或以後，因東方宗主教與羅馬宗座的決裂而造成的。其它的分裂是在四個世紀以後，發生在西方，由於人們所稱革新事件的發生。結果許多國家的或教派的團體，與羅馬宗座分離。其中，特別是英國教會。(UR 13)

d. 有關東方教會的特別考查：

在東方有許多區域或地方教會，其中第一級就是宗主教所轄教會，它們中好多因為是宗徒們親自所創的教會，而引以為榮。

東方教會持有寶藏，西方教會從中獲益匪淺。基本的信理都是在東方所召開的大公會議中作了定論。為保存他們的信仰，這些教會曾受很多苦，現在還在受苦。

大公會議勸衆人要細心查考東方的教會，它們的創立時代，它們的發展及在決裂前與羅馬宗座間所有的關係，而後對這數點作一個公正的評論。至於某種「聖事上的相通」，不但可能，而且推薦（請參閱：《東方禮天主教會法令》）。(UR 14)

大公會議，為消除一切疑問，隆重宣佈東方的教會，有權依他們自己的法律來管理。這一傳統原則的切實遵守—老實說，它並未常受尊重—為建立合一，是絕對必須的先決條件之一。(UR 16)

我們必需看出，東西二方的不同神學公式，屢次是相輔相成的，而不是相背的。至於東方人的真正聖傳，我們應該承認

他們，是卓越地根據于聖經的；發展並表達於禮儀生活之中；是來自宗徒們口傳，藉東方教父及靈修作家們的著作培養起來的。（UR 17）

e. 西方的分離教會與宗教團體：

在西方與羅馬宗座分離的教會與宗教團體，以一種特別的親屬關係，還保持與天主公教的連繫。

他們之間彼此顯然不同；因此，很難做適當的定義。必需承認，在他們與天主教會之間，不但是在歷史、社會、心理和文化特性上，特別是在解釋啓示的真理上，有著相當的不同之處，即使對基督教會團體的來源及中心這一點上，也有很大的差異。

因領洗聖事，人真的加入了基督之內。不過，聖洗自身不過是開始.....因沒有神品聖事，與我們分離的團體，沒有保存聖體奧蹟。雖然如此，他們在舉行聖餐時，承認生命在於與基督共融。爲此，對主最後晚餐的道理，其他的聖事，教會的敬禮與職務，都該是會談的對象。（UR 23）

這些弟兄們的基督化生活，是靠信基督而滋養，靠聖洗的恩寵及天主聖言的宣講而獲益。它表露在個別的禱告、默思聖經、基督化家庭的生活、爲讚美主而聚在一起的團體的敬禮中.....大公的會談，能從福音的應用於道德這一方面開始（UR 23）。換言之，我們能以靈修和社會工作的合作做爲合一的初步進路。

從以上法令的摘要中，我們不難看出，教宗保祿六世對合一運動的努力。教宗爲了使內容及形式更清晰、更正確起見，還親自修改了原則上已爲教長通過的大公主義法令。最重要的修改是第三章講與羅馬宗座分離的基督徒時，表示公教會對大公主義有了新的立場：在標題上，已不說：與公教分離的基督

徒，而注重教會及團體；說與羅馬宗座分離，不是與公教分離，它與其它教會及團體，仍有聯繫¹⁸。除此之外，教宗在行動上，也有一些具體的表現。這將會在下一節中討論。

2. 合一的具體表現

a. 教宗至耶路撒冷朝聖

1964年1月4日至6日，教宗保祿六世去耶路撒冷朝聖。這是自教宗比約七世於1809年被俘擄以來，教宗第一次出離義大利國境。教宗此次朝聖的目標，是爲了尋求合一。我們能從教宗在梵蒂岡大公會議第二期大會閉幕詞中知道。教宗說：

「伯鐸由福地出發，他的繼承人卻沒有回去過。我們要回去，雖然爲時短促，去祈禱、做補贖、革新，將教會獻於基督，使分離的弟兄皈依獨一的聖教會，求主賞賜世界和平，求基督拯救整個人類。¹⁹」

在這次的朝聖中，教宗在宗座代表處接見了東正教耶路撒冷 Benedict 宗主教和 Athenagoras 宗主教。Athenagoras 宗主教和教宗見面時互相擁抱親吻和平。在教宗的回訪中，他倆一起唸了若望十七章，基督祈求信友們合一的福音²⁰。

所以教宗聖地之行，是回返教會的發祥地，福音的原始，是一種謙卑愛德的旅行，對世界和平，信友合一，有莫大的貢獻。這次旅行的精神及合一的意義，可說是教會在大公會議時代的頂峰！

b. 教宗訪問印度

第三會期閉幕後不久，教宗赴印度參加第卅八屆國際聖體

¹⁸吳宗文，前引書，250頁。

¹⁹陳文裕，前引書，137頁。

²⁰同上。

大會。在此，他也說出了此行的目標；其中之一便和合一有關。他說：

「我們當互相了解、羨慕、親愛、同心合意。我們不當以旅客身分相會，而如尋找天主的人，不在大石建築的教堂中，而在人心內。在相互瞭解後，我們共同努力，建設人類的前途。我們尋找實際能合作的方式，統一財源、努力，以達到各國間的融合。²¹」

c. 合一禮儀

在梵二大公會議結束的前夕，教宗與觀察員在聖保祿大殿，外邦人的宗徒墓前，同聲請求全體信友合而為一，這種共同祈禱，在教會分裂後的歷史上是空前的。

此時，教宗綜合大會對合一的貢獻時說：

「天主教承認自己的過失及不良的心情，我們求天主及你們寬恕；我們發覺它並非由公教根源而來，我們決定以基督門徒的心情來改正它；棄絕帶有成見得罪人的辯論，更不顧及面子問題。²²」

d. 絕罰的取消

在梵二大公會議結束的前夕，除了合一禮儀外，還有一個突破，就是絕罰令的取消。東西方教會同意取消 1054 年造成決定性分裂的絕罰令。

教宗保祿六世派遣了一個代表團赴君士坦丁堡，在奈德納宗主教和議會前宣讀了共同聲明。

同時，一個東正教的代表團，以梅里東（Méliton）為首，在聖伯多祿大殿參加了教宗和二十多位主教所奉行的共祭（彌撒）；在禮節進行期間，梅里東宗主教宣讀了同樣的聲明。此

²¹同上，178 頁。

²²吳宗文，前引書，364 頁。

聲明爲：

「這是相互諒解的誠懇表示，並共同邀請，在彼此信任尊重和互相的友愛下，彼此進行商談，以期賴天主的助佑導致雙方，在信德和友愛的完美融合中生活，那本是東西教會在他們歷史的最初千年中早已存在的現象。²³」

雖然教宗在具體的行動上做了不少努力，可是並不能說立刻就有「教會合一」的出現，它仍需要一段時間，亦如貝雅（Bea）樞機所說的：「解決各教派教義上的爭議，可能需要幾十年或幾個世紀！」

但做了這一些事，就是一個「精神的轉變」。就像教宗自己所說的「對教會有利的偉大事件的開始」²⁴。

結論

在兩位教宗的帶領下，教會與教會之間走上了合一之路，也給基督的教會開啓了新的一頁。

如果說，若望廿三世是合一的推動者；那麼，保祿六世則是它的實踐者。

若望廿三世，召開了梵二大公會議，並設立了基督徒合一秘書處，這是在態度上的轉變。此轉變，將會幫助我們消滅尖銳的歧見，也有利合一的目標。

然而，保祿六世卻更具體地要求我們內心的改革，這是最根本的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要完全靠著祈禱和懷著基督的愛去走合一的道路。此合一，並不是要對方歸向我，而是我們一同走向基督，而在基督內合一。

²³穆啓蒙著，陳百希、侯景文譯，《天主教史卷四》（台北：光啓，1990年，六版），316~317頁。

²⁴徐熙光編著，《保祿六世及其思想》（台北：新紀元出版公司，1966年），12頁。

雖然，兩位教宗在合一方面有著不同的貢獻，但兩者都離不開態度上的轉變和內心改革這兩點。所以，只要我們切實掌握這兩點，相信基督宗教合一運動的成功，必定在廿一世紀中指日可待。